

人们为什么会创业?

——基于风险、企业家能力与金融约束的影响因素研究

Why Do People Start Up a Business?

Determinant Analyses Based on Risk,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and Financial Constraints

张 舰 Scott Rozelle

ZHANG Jian

Scott Rozelle

[摘要] 创业活动对经济增长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广泛搜集、梳理了国外自主创业理论和相关实证研究,并对相关文献进行了归纳、分析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我们对未来自主创业研究领域指出了新的研究方向。首先,本文从理论层面分析影响人们做出不同就业选择的因素。通过文献的梳理与综述,我们发现现有的文献给出了四组理论来解释创业选择活动:风险规避、企业家能力、金融约束,以及将企业家能力和金融约束相结合来解释创业行为。其次,本文对实证分析就业选择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归纳。这一部分重点着眼于计量方法,以及在就业选择实证文献里,作者如何解决相应的计量问题,并对现有的实证论文所获得的最重要结论进行了总结和归纳。第三,在理解了就业选择的理论及实证结论之后,本文概述了在这一领域的中国文献,归纳了在中国这一特定的经济环境下就业选择研究的重要结论。最后,本文指出了未来自主创业研究领域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 自主创业 风险态度 企业家能力 金融约束 中国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549(2017)08-65-12

Abstract: Entrepreneurship cannot be emphasized enough in the overall growth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overall goal of this paper is to understand by surveying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extensively how theories and empirical work on entrepreneurial choice can help us understand choices individuals are making in labor markets. First, this paper reviews four sets of theories that try to answer the question: risk aversion;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financial constraint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financial constraints and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Second, this paper reviews a large body of papers that are concerned with testing hypotheses about the determinants of occupational choice. Our focus will be on understanding the econometric approaches, how the authors deal with the econometric problems in the occupational choice literature and reviewing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sults. Third, this paper directly assesses the state of China's literature in this area. Finall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possible future research topics and directions in this area.

Key words: Entrepreneurship Risk attitude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Financial constraints China

[收稿日期] 2017-02-20

[作者简介] 张舰,男,1977年1月生,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教育、劳动力和应用计量经济学。Scott Rozelle,男,1955年7月生,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教育和中国经济。

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多数经济学家相信企业家精神 (Entrepreneurship) 对经济增长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Schumpeter (1943, 第 132 页)^[1] 认为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 (the primitive mover of economic growth); De Soto (1989, 第 243 页)^[2] 把企业家的创业活动描述成经济发展的基础 (the foundation of development)。本文通过对国外自主创业理论和相关实证研究的广泛综述, 来理解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上进行自主创业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方式。个体的经济行为在本质上可以分为两类: 受雇用和自主创业。人们在这两种经济行为中的选择, 可以以固定收入和不确定收入作为区分标准。受雇者获取固定收入, 而自主创业者的收入不确定。本文主要试图理解为什么人们会在这两种经济行为中做出不同选择及影响其选择的因素。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 本文将通过四个部分的内容, 对现有文献进行详细的分析和归纳。近年来, 与就业选择相关的经济学文献类型主要分为理论文献与实证文献。本文的第一部分将首先从理论层面分析影响人们做出不同就业选择的因素。通过文献的梳理与综述, 我们试图理解哪些个人属性和组织要素影响人们的就业选择。针对该问题, 现有的文献给出了四组理论: 风险规避 (Risk Aversion, Kihlstrom 和 Laffont, 1979^[3])、企业家能力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Chamley, 1983^[4]; Evans 和 Jovanovic, 1989^[5])、金融约束 (Financial Constraint, Eswaran 和 Kotwal 1986^[6]; Banerjee 和 Newman 1993^[7]; Ghatak 和 Jiang 2002^[8]) 以及将企业家能力和金融约束相结合进行解释的理论 (Evans 和 Jovanovic, 1989^[5]; Colombo 和 Valentinyi, 2002^[9])。这些文献的作者多数通过构建一般均衡与局部均衡模型, 来分析为什么上述因素会诱致一些人选择受雇用, 接受固定工资, 而另一些人愿意选择自主创业。

与就业选择相关的另外一部分经济学文献主要是来自于劳动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理论的实证分析。因此, 本文的第二部分梳理和归纳实证分析就业选择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这一部分将具体讨论风险态度、企业家能力和信用约束影响就业选择的实证论文, 重点着眼于计量方法, 以及在就业选择实证文献里作者如何解决相关计量问题, 并对现有的实证论文所获得的重要结论进行总结和归纳。在理解了就业选择的理论及实证结论之后, 本文的第三部分梳理在这一领域里的中国文献, 归纳在中国这一

特定的经济环境下有关就业选择研究的重要结论。本文的最后一部分指出了自主创业研究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

一、就业选择理论: 人们为什么选择不同的就业方式?

(一) 风险规避理论 (Risk Aversion)

人们为什么会选择不同的职业? Kihlstrom 和 Laffont (1979)^[3] 认为由于人们内在对待风险的态度有所不同而导致选择不同职业。厌恶高风险的人倾向于受雇用而喜好风险或风险厌恶程度低的人选择自主创业。Kihlstrom 和 Laffont 的理论具体如下: 假设经济体中的个体 i 服从伯努利效用 (Bernoulli Utility) 函数 $u_i(I)$, I 代表收入且非负。个体具有相同的初始财富 A , 但是具有不同的风险厌恶程度 (以 Arrow-Prat 绝对风险厌恶指标来衡量)。对于任意的两个个体 i 和 j , 如果 i 比 j 更加厌恶风险, 则对所有的 $I \in (0, \infty)$ 则有:

$$r_i \equiv -\frac{u''_i(I)}{u'_i(I)} \geq -\frac{u''_j(I)}{u'_j(I)} \equiv r_j$$

经济体中的每个个体都可以使用一种仅需劳动但具有风险的技术。该技术由一个连续的生产函数 $y = g(L, x)$ 来表示。这里 $y \geq 0$, L 代表劳动, x 则是一个随机变量, 取值范围为 $[0, \bar{x}]$, $0 < \bar{x} < +\infty$ 。该个体可以选择创业, 并通过使用该技术和雇用劳动力获得随机收入, 或者选择受雇用, 接受固定的由市场决定的竞争性工资 w 。需要指出的是, 这里假定选择自主创业的个体在随机变量 x 确定后, 再决定雇用多少劳动力。因此, 对于任意一个确定了的 x (确定了的 x 由 \tilde{x} 表示), 自主创业的利润是 $g(L^*, \tilde{x}) - wL^*$, 此处 L^* 代表最优劳动投入, 并且是 \tilde{x} 的一个函数。给定工资水平 w , 个体通过两个步骤来选择就业: 首先, 他需要计算每种职业的期望效用; 其次, 他从中选择具有最高期望效用的就业方式。当

$$Eu(A + g(L^*, x) - wL^*) \geq u(A + w)$$

个体将选择创业; 当

$$Eu(A + g(L^*, x) - wL^*) \leq u(A + w)$$

个体选择受雇用, 获得固定工资 w 。当劳动力市场出清时, 市场达到均衡。在均衡工资水平下, 选择自主创业的个体对劳动力的加总需求水平等于选择受雇用个体的加总劳动力供给水平。当然在均衡工资水平

下,存在一部分个体被称之为边际个体,他们选择创业或者被雇用所获得效用相同,并且他们对风险的厌恶程度是相同的。Kihlstrom 和 Laffont 的均衡分析显示与这些边际个体相比,风险厌恶程度低的人选择创业,而风险厌恶程度高的人选择受雇用。

该理论的经济学直觉如下(严格的数学证明见 Kihlstrom 和 Laffont (1979)^[3])。相较于风险厌恶程度低的人,风险厌恶程度高的个体需要一个较高的工资水平,才能使得他们在该工资水平下,选择自主创业和受雇用所获得的期望效用相同。这样一个对于个体而言自主创业和受雇用无差异的工资水平,我们称之为确定性等价工资(Certainty Equivalent Wage)。经济体中的个体由于风险厌恶程度不同,他们的确定性等价工资也不同。风险厌恶程度高的个体,他们的确定性等价工资也较高。当确定性等价工资低于市场出清时的竞争性均衡工资水平时,该个体就会因为当前工资相对较高,选择受雇用;否则,该个体会选择自主创业。由于风险厌恶程度高的个体较风险厌恶程度低的个体,具有较高的确定性等级工资水平,因此给定竞争性的市场工资水平,他们倾向于受雇用而风险厌恶程度低的个体更有可能选择自主创业。显然,该理论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风险厌恶程度对于创业选择有负面影响。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作者所做的隐含假设。首先,Kihlstrom 和 Laffont 假定该经济体并不存在金融市场,个体有足够的初始财富去创业,因此他们不需要从金融市场中借贷。第二,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具体来说,劳动者所付出的努力可以完全被观察到(即模型中不存在道德风险)。尽管该模型不存在一个金融市场,但是我们可以认为 Kihlstrom 和 Laffont 的模型是一个新古典就业选择模型,因为他们模型中所涉及的市场都是完美运行的。然而,在本文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会看到其他的就业选择理论都强调了市场失灵在就业选择中的角色(例如,金融约束和道德风险对于就业选择的影响)。我们将详细讨论这些问题。第三,个体都拥有相同的初始财富。Kihlstrom 和 Laffont 提到初始财富会影响就业选择,但是他们的解释与其他理论的解释并不相同。假设人们拥有相同的效用函数,并且 Arrow-Prat 绝对风险厌恶指标随着财富的增加而下降,那么富有的个体往往更愿意承担风险,这也意味着他们相较于贫穷的个体而言,更有可能选择自主创业。然而,大多数

就业选择理论认为富有的个体更有可能选择自主创业并不是由于风险厌恶程度,而是因为信贷约束的环境下,拥有较多财富的个体更有可能提供较多的抵押品,进而更容易获得自主创业所需要的信贷。其结果是,拥有更多财富的个体更有可能选择自主创业。

(二) 企业家能力

Kihlstrom 和 Laffont 的模型不能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即便人们拥有创业所需足够多的资本,为什么还是会做出不同的就业选择。Chamley (1983)^[4]认为除了风险厌恶程度外,企业家本身的能力(Entrepreneurial Ability)也是一个影响就业选择的重要因素。具有较强企业家能力的个体相较于企业家能力弱的个体,更有可能选择创业。在 Chamley 的模型里,假设个体具有相同的伯努利效用函数 u 。个体具有相同的初始财富水平 a ,但是具有不同的企业家能力 $s, s \in [0, 1]$ 。个体可以通过使用某种技术进行创业,这种技术需要一定的资本投入。个体也可以进入劳动力市场,成为工人。劳动力市场规模足够大,工资水平 \bar{w} 和无风险资本回报率 R 对于个体而言外生。该技术的生产函数为 $f(k)$,但是生产过程是有风险的,并且有两个可能的结果:如果生产过程成功的话,产出水平是 $f(k)$;否则,产出水平是 0。生产过程成功的概率与企业家能力 s 相等。与 Kihlstrom 和 Laffont 的模型不同的是,该模型存在风险中性的金融机构并且由于完全竞争的结果,它的利润为 0。因此,企业贷款的均衡利率是:

$$r = \frac{R}{\bar{s}}$$

这里 \bar{s} 是那些选择创业的个体所具有的企业家能力的平均水平。

个体在自主创业和受雇用中选择较高预期效用的就业方式。一个具有企业家能力 s 的个体选择创业的效用函数为:

$$U = s \times u(f(b + a) - rb) + (1 - s) \times u(0)$$

受雇用的效用函数为 $u(\bar{w} + Ra)$ 。这里 b 是最优借债量,并满足条件

$$f'(b + a) = r$$

选择创业的效用随 s 增加而增加。市场均衡可以用企业家能力 s^* 和利率水平 r 来表示。在达到市场均衡

时，选择创业或是受雇用对于具有企业家能力 s^* 的个体并无差异；同时，借贷利率 r 使得金融机构的利润为 0。因此，在市场均衡时， s^* 和 r 由以下三个方程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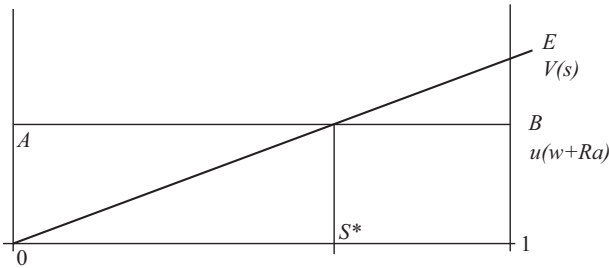
$$u(\bar{w} + Ra) = s \times u(f(b + a) - rb) + (1 - s) \times u(0)$$

$$r = \frac{R}{s}$$

$$f'(b + a) = r$$

$$\text{这里 } \bar{s} = \frac{\int_0^{s^*} sF(s)}{\int_0^{s^*} dF(s)}$$

企业家能力高于 s^* 的个体选择创业而低于的选择受雇用。这个关系如图 (chamley, 1983)^[4] 所示：



在上图中， OE 线代表选择创业的间接效用水平，它是一个随企业家能力 s 增加而增加的线性增函数；受雇用的效用由水平线 AB 表示。

该理论的经济学直觉如下：个体在使用有风险的生产技术进行创业的时候有两种结果：成功或者失败。Chamley 假定成功的概率随着企业家能力的提高而增加，因此该个体选择创业的间接效用是企业家能力的一个线性增函数。然而，由于个体有着相同的偏好和初始财富，他们选择受雇用的效用相同。因此，企业家能力在均衡水平之上的个体选择创业，将会获得更高的效用，而处于均衡水平之下的个体会选择受雇用。该理论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企业家能力对创业选择有正的影响。

(三) 金融约束和初始财富

另外一组理论 (Eswaran 和 Kotwal 1986^[6]; Banerjee 和 Newman 1993^[7]; Ghatak 和 Jiang 2002^[8]) 认为在就业选择中金融约束 (financial constraint) 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既然自主创业需要一定的最低水平的初始投资，那些受到金融约束 (信贷约束) 的人更有可能选择受雇用而不是自主创业。Eswaran 和

Kotwal (1986)^[6] 的模型显示在农业生产占主导的经济中，能够获得大量营运资本 (working capital) 的人选择创业，而那些无法获取足够营运资本的人则选择受雇用或者成为自耕农。

假设经济中的个体具有如下的效用函数：

$$U(Y, R) = Y + U(R)$$

这里 Y 代表收入， R 代表闲暇时间。个体选择创业时使用一种需要土地 (h) 和劳动 (L) 两种投入要素的技术，其生产函数为：

$$q = \varepsilon f(h, L)$$

这里的 q 是产出， ε 是一个正的随机变量，期望值为 1。个体可以在竞争市场上雇用劳动力和租地，价格分别是 w 和 v 。产出价格 P 是一个给定的外生变量。如果选择雇用工人，由于道德风险的原因，监督必不可少。假设监督技术是 $s = s(L)$ ，此处 s 是监督 L (雇用来的劳动力) 所需花费的时间。每一个体都有时间长度为 1 个单位的劳动力和 h 单位的土地，他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出售自己的一部分时间 t ，在土地市场上租赁土地。那么他的时间约束条件必须满足

$$1 - R - t - s(L) \geq 0$$

假设个体可以获得的营运资本为 B ，该营运资本量取决于他拥有的土地量。那么营运资本的约束条件为：

$$vh + w(n - l) \leq B - K + v\bar{h} + wt$$

这里 n 代表所使用的全部劳动， l 是他自己提供的劳动， h 是他所耕种的土地数量， K 是初始的固定成本。个体追求最大的预期效用，其最优化问题如下：

$$\text{Max}_{R, h, t, L} pf(h, l + L) + wt - v(h - \bar{h}) - wL - K + u(R)$$

约束条件：

$$B + wt \geq vh + wL$$

$$l \equiv 1 - R - t - s(L) \geq 0$$

$$B \equiv B - K + v\bar{h}$$

$$L \geq 0, t \geq 0$$

$$L \equiv n - l$$

Eswaran 和 Kotwal (1986)^[6] 的分析表明 B 会有三个临界值，分别为 B_1, B_2 和 B_3 ，且有 $0 < B_1 < B_2 < B_3$ 。当 $0 \leq B < B_1$ 时，个体选择受雇用 ($t > 0, l > 0, L$

$= 0$); 当 $B_1 \leq B < B_2$ 时, 该个体成为自耕农 ($t = 0, l > 0, L = 0$); 当 $B_2 \leq B < B_3$ 时, 该个体成为小规模的农业企业家 ($t = 0, l > 0, L > 0$); 当 $B \geq B_3$ 时, 该个体成为大规模的农业企业家 ($t = 0, l = 0, L > 0$)。

该模型的经济学直觉如下 (严格证明, 参照 Eswaran 和 Kotwal^[6]): 农业经济中的个体受限于营运资本, 只能租到少量土地, 这导致土地上的劳动边际收益较低。当劳动的边际农业产出收益等于劳动力市场上单位时间工资时, 他在耕种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劳动时间分配达到最优。在这种情况下, 该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上受雇用, 同时也是一个自耕农。随着营运资本的增加, 个体能够租到更多的土地, 进而获得更高的劳动边际收益。这意味着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他会在劳动力市场上减少劳动时间, 花更多的时间耕种自己的土地。因此, 不难看出营运资本存在某一临界值, 达到该临界值时, 个体将停止在劳动力市场上出售自己的劳动, 完全成为一个自耕农。然而, 当他获得的营运资本超过了这个临界值, 他并不会立即在劳动力市场上雇用劳动。这是因为雇用劳动需要被监督, 雇用劳动的单位成本实际上等于工资与监督成本之和。因此, 随着营运资本的增加, 个体会首先选择在土地上增加自己的劳动时间, 减少娱乐休闲时间, 而不是直接雇用劳动。直到营运资本增加到另外一个水平时, 即劳动的边际农业产出收益等于工资与监督成本之和, 个体才会开始雇用并且监督劳动, 同时, 他也会投入自己的劳动进行耕种, 从而成为小规模的农业企业家。随着营运资本的继续增加并且超过第三个临界值时, 即该个体投入自己的劳动时, 他的第一个单位劳动投入所获得的边际收益等于雇用劳动的单位成本时, 该个体将会把自己的全部时间用于监督雇用劳动。此时, 小规模的农业企业家成为大规模的农业企业家。

尽管 Banerjee 和 Newman (1993)^[7]、Ghatak 和 Jiang (2002)^[8] 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就业选择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 但是他们的研究显示了金融约束与个体初始财富如何相结合, 影响人们的就业选择。具有较低初始财富水平的个体不得不选择受雇用。这是因为相较于初始财富较高的个体, 初始财富较少的个体

往往没有足够的抵押品, 很难在金融市场上获得贷款。初始财富较多的人可以选择受雇用或者创业, 但是其决定取决于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当经济体中的大部分人都是穷人时, 富有的个体往往愿意选择自主创业, 这是因为他们可以利用劳动力市场上供大于求所导致的低工资。当经济体中的人们普遍比较富裕时, 他们倾向于受雇用, 因为劳动力供给不足, 工资水平相对较高。这表明工资水平与创业活动之间具有负向关系。从该模型中得出的可验证假说为, 如果个体信贷取决于他们的初始财富, 在工资和其他条件都相同时, 初始财富对创业活动具有正向的影响。

(四) 企业家能力与金融约束相结合

真实世界里自主创业是一个复杂的决策过程, 很难说是由于某单一因素 (企业家能力、风险厌恶程度或者是金融约束) 所决定。Evans 和 Jovanovic (1989)^[5]、Colombo 和 Valentinyi (2002)^[9] 的研究表明, 企业家能力与金融约束程度的不同组合会导致人们做出不同的就业选择。如果我们假定金融约束程度取决于个体的初始财富, 那么这意味着企业家能力与初始财富水平的不同组合, 会得到不同的就业选择结果。假设个体的风险偏好是中性的, 该个体可以选择受雇用也可以选择自主创业。受雇用的工资水平由其工作经验和教育水平决定, 而创业活动只需使用资本。受雇用的工资方程为:

$$w = \mu x_1^{\gamma_1} x_2^{\gamma_2} \xi$$

这里 x_1 是该个体的工作经验, x_2 是他的教育水平, μ 是常数, ξ 是一个随机变量。创业的收入方程可以表示为:

$$y = \theta k^\alpha \varepsilon$$

其中 θ 是企业家能力, k 是资本水平, ε 是随机变量, 其均值为 1, $\alpha \in (0, 1)$ 。选择创业的个体可以获得与其财富成比例的资本, 用方程表示为:

$$0 \leq k \leq \lambda z$$

这里 z 代表该个体拥有的初始财富。这个约束条件表明一个人的初始财富越多, 他所受到的金融约束程度越低。^① 作为一个企业家, 他的预期利润最大化方程为:

① 这里金融约束程度被假定为初始财富的线性函数, 并且是外生给定的, 但是其他函数形式也是有可能的并且可能是内生的。参见 Banerjee 和 Newman (1993)。

$$\text{Max}_{0 \leq k \leq \lambda} \theta k^\alpha + r(z - k)$$

这里 r 是利率, $r(z - k)$ 代表向金融机构出借自己财富 $(z - k)$ 所获得的收入。如果最优 k^* 大于其可获得的资本总额, 该个体受到金融约束 (信贷约束)。否则, 该个体将不受金融约束。不受信贷约束的企业家最优 k^* 为:

$$k^* = \left(\frac{\theta\alpha}{r}\right)^{\frac{1}{1-\alpha}}$$

若企业家的信贷不受约束, 他的 θ 必须满足

$$\theta \leq (\lambda z)^{1-\alpha} \frac{r}{\alpha}$$

对于受到信贷约束的个体, 很明显他的最优资本投入为:

$$k^* = \lambda z$$

所以, 当企业家的信贷不受约束时, 我们可将他的最优资本投入代入创业收入方程, 从而获得该个体选择自主创业的收入:

$$y = \theta^{\frac{1}{1-\alpha}} \left(\frac{\alpha}{r}\right)^{\frac{\alpha}{1-\alpha}} \varepsilon$$

当企业家的信贷受约束时, 将其最优资本投入 λz 代入创业收入方程, 我们获得他选择自主创业的收入为:

$$y = \theta(\lambda z)^\alpha \varepsil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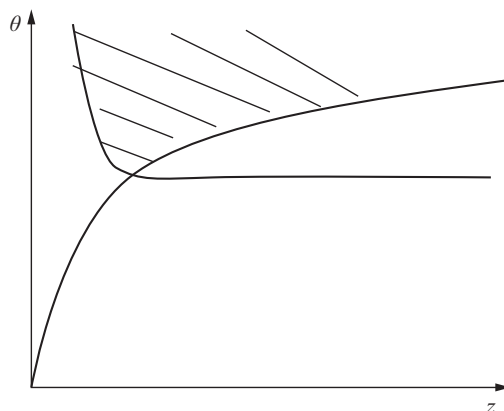
将受约束和不受约束两种情况的最优资本投入与创业收入代入到预期利润最大化目标函数中, 我们获得企业家在受约束和不受约束情况下企业家最大化预期利润。将受约束与不受约束最大化预期利润同工资 $w = \mu x_1^{\gamma_1} x_2^{\gamma_2} \xi$ 相比, Evan 和 Jovanovic 得到了如下条件 (数学证明, 参见原文): 如果个体的企业家能力 θ 与初始财富 z 满足

$$\begin{aligned} \mu^{1-\alpha} \left(\frac{r}{\alpha}\right)^\alpha (1-\alpha)^{\alpha-1} x_1^{\gamma_1(1-\alpha)} x_2^{\gamma_2(1-\alpha)} &\leq \theta \\ &\leq (\lambda z)^{1-\alpha} \left(\frac{r}{\alpha}\right)^{1-\alpha} \left(\frac{r}{\alpha}\right) \end{aligned}$$

该个体将会是不受信贷约束的企业家。如果企业家能力和初始财富满足

$$\theta > \text{Max} \left[(\lambda z)^{1-\alpha} \left(\frac{r}{\alpha}\right), \mu x_1^{\gamma_1} x_2^{\gamma_2} (\lambda z)^{-\alpha} + r(\lambda z)^{1-\alpha} \right]$$

该个体将会是受信贷约束的企业家。其他情况, 个体将会选择受雇佣。下图 (Evans 和 Jovanovic, 1989)^[5] 展示了企业家能力 θ 与初始财富 z 相结合后是如何影响就业选择的:



该模型的经济直觉如下: 对于个体而言, 不受信贷约束的预期利润至少和受约束的预期利润一样大。生产函数中的企业家能力在任何资本投入水平上均提高总产量和边际产量。其结果为, 给定个体选择创业 (无论是受信贷约束或者不受约束情况), 在任何一个资本投入水平上他的利润都随着企业家能力的提高而增加。然而, 工资是由工作经验和教育水平决定的外生变量。因此存在一个临界企业家能力水平, 个体在该临界值处, 不受信贷约束的预期利润和受雇佣所获得的工资收入对该个体而言无差异。如果企业家能力低于该临界值, 不论他的初始财富有多少, 他将会选择受雇佣。这是因为低于该临界值的企业家能力将会导致不受约束的企业利润低于工资水平, 而该利润至少和受约束的企业利润一样大。当个体不受信贷约束时, 他的企业利润不取决于他能获得多少贷款, 也不取决于他的初始财富。因此, 不管初始财富是多少, 比临界企业家能力值低的个体选择受雇佣, 这对于个体而言都是最优的。如果个体的企业家能力高于临界值, 初始财富开始变得重要了。这是因为当个体的企业家能力高于临界值, 不受信贷约束的企业利润比工资水平要高而受信贷约束的企业利润也可能比该工资水平要高, 因此个体的初始财富越多, 他越有可能选择创业, 他的创业可能是受到信贷约束也可能没有受到信贷约束。

从该理论中可以得出的一个可验证假说是如果个体拥有足够高的企业家能力, 初始财富对于选择自主

创业有正的影响。如果企业家能力太低，初始财富多少则变得无关紧要。^① 该理论同前述的金融约束理论明显不同。金融约束理论认为不论个体的企业家能力如何，初始财富都非常重要。我们可以将金融约束理论称为“初始财富无条件重要理论”（unconditional importance of initial wealth theory），而企业家能力与金融约束相结合的理论可以称为“初始财富有条件重要理论”（conditional importance of initial wealth theory）。此外，该理论对于企业家能力的界定与 Chamley (1983)^[4] 不同。在 Chamley 的模型中，较高的企业家能力增加了高产出的概率，这意味着较高的企业家能力使得产出函数的分布向右倾斜。在企业家能力与金融约束相结合的理论中，较高的企业家能力在所有的资本投入水平上均增加了产出，这意味着较高的企业家能力使得产出分布整体右移。

二、就业选择的实证研究：现实中就业选择的影响因素

这一部分，我们考察关于就业选择的实证研究。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概括评述就业选择的实证研究：就业选择的计量方法、模型估计所遇到的计量问题以及实证研究所获得的重要结论。在构造就业选择模型和检验就业选择理论的实证文章中，主要有三种计量方法：选择模型、结构模型和半参数方法。一直困扰着实证经济学家的计量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财富的内生性问题，二是企业家能力和风险厌恶程度及其影响难以度量。我们将在这一部分说明就业选择实证文献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并且得出了怎样的重要结论。

（一）就业选择的计量方法

实证论文主要涉及三种计量方法：选择模型（choice model）、结构模型（structural model）和半参数方法（semi-parametric method）。一些实证研究直接选择使用创业概率的简化式模型（reduced form）来估计自主创业的影响因素。这些研究将自主创业概率视为一系列外生变量的函数，然后利用 Probit 或 Logit 选择模型估计简化式回归方程的参数。

利用选择模型进行简化式估计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所估计出的外生变量系数常常包含了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对于自主创业的影响往往各不相同，甚至互相冲突。这些因素通常很难被度量，因而无法直

接进入简化式回归方程中进行估计。举个例子来讲，实证研究经常发现个人的初始财富对创业活动有积极的显著影响。然而，风险态度、企业家能力和金融约束程度都和个人初始财富相关。同时，这些因素很难被度量，无法直接进入回归方程中。因此，个人初始财富对于创业活动的积极影响可能是由于这些因素任意之一或由它们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对简化式估计结果的行为解释，我们必须保持谨慎态度。

由于风险态度等因素很难被直接度量，一些实证研究转向构造和估计结构模型（例如，Evans 和 Jovanovic, 1989^[5]）。这些研究设定具体的效用和生产函数，并在这些函数中加入随机项，求解效用或者是收入的最优化模型，从而得到选择创业的数学条件。这些条件在数学形式上常常被表达为一些不可观测变量（例如企业家能力）的数学区间，对于不同区间，个体相应地做出不同的就业选择。这些不可观测变量被假定服从某一统计分布（例如正态分布），从而这些研究可以获得极大似然函数（maximum likelihood function），通过极大似然估计将结构模型的参数估计出来。

第三种方法是半参数估计。Mesnard 和 Ravallion (2002)^[10] 对创业概率和初始财富之间可以是任何一种函数形式提供了理论支持。这一结论促使他们使用了半参数估计方法。LOWESS 和 Kernel 回归是在半参数估计中经常被用到的两种方法。

（二）模型估计所遇到的重要计量问题

第一个重要计量问题是财富的内生性问题。尽管初始财富在个人选择创业之前就已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初始财富的内生性问题并不存在。这里的内生性来源于个人可能为了创业而事先积累财富，也就是可能存在一个逆因果关系。换句话说，在这里个人的初始财富不是选择创业的因，而是选择创业的果。对这一问题的一个解决办法是将用于创业的那部分财富从个人初始财富中扣除出去（Paulson 和 Townsend, 2001^[11]）。另外一个解决办法是利用所继承的遗产来代替初始财富或者作为初始财富的工具变量（Blanchflower 和 Oswald, 1990^[12]；Burke 等, 2000^[13]）。遗产作为初始财富的组成部分往往是外生给定的。

第二个问题是在简化式估计中，如何测量企业家

① 当然，如果自主创业需要最低资本投入，那么可以断定的是如果个体的初始财富很少，企业家能力对于选择自主创业是没有影响的。由于无法获得所需要的最低资本投入，该个体没有别的选择，必然选择受雇用。如果所需要的资本投入可以分割，那么他的初始财富越少，选择自主创业所要求的企业家能力就越高。

能力和风险态度及其影响。据我们所知,很少有文章明确地解决这一问题。风险态度、企业家能力和金融约束的影响交织在一起,并在简化式估计中都体现在初始财富这一变量的系数上。分解这些因素的影响即便是可能的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些论文(例如,Paulson 和 Townsend, 2001^[11])使用教育水平作为企业家能力的代理变量。然而,教育并不是企业家能力的一个完美指标,因为其他一些变量,例如经验和培训,也能部分代表企业家能力。此外,Burke 等(2000)^[13]尝试利用“选择工作时工作的稳定性是否为最重要的考量因素”这一虚拟变量来代表个体对待风险的态度。

(三) 实证研究所获得的重要结论

大多数的半参数估计发现,在控制住其他变量之

后,初始财富和创业的可能性之间都存在着一个正的相关关系,不论它们之间是凸的还是凹的关系(Paulson 和 Townsend, 2001^[11]; Mesnard 和 Ravalion, 2002^[10])。对于结构模型的估计,Evans 和 Jovanovic (1989)^[5]发现初始财富和企业家能力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因此,假定人们是风险中性的,他们断定在简化式估计中所获得初始财富对创业的正影响应该这是由于信贷约束。^①然而,Xu (1998)^[14]利用同样的结构模型和检验方法发现初始财富和企业家能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他将结论的差异归因于 Evans 和 Jovanovic 所用到的财富数据被低估了。我们将简化式估计所获得的重要实证结果归纳于表 1。

表 1 不同论文对于自主创业影响因素估计的总结^a

	初始财富	初始财富平方	教育	受雇佣经验	企业家经验 ^b	年龄	年龄平方
Evans 和 Leighton (1989) ^[15]	+; 显著	-; 显著	+; 多数不显著	+或-; 不显著	+; 显著		
Evans 和 Jovanovic (1989) ^[5]	+; 显著	-; 不显著	-; 不显著	+; 显著			
Holtz-Eakin 等 (1994) ^[16]	+; 显著					+; 不显著	-; 显著或不显著
Blanchflower 和 Oswald (1998) ^[12]	+; 显著	-; 显著			+; 显著		
Dunn 和 Holtz-Eakin (2000) ^[17]	+; 显著		+; 显著 ^c			+; 显著	-; 不显著
Burke 等 (2000) ^[13]	+; 显著	-; 显著	-; 多数不显著		+; 显著		
Paulson 和 Townsend (2001) ^[11]	+; 显著	-; 不显著	+; 或显著或不显著			-; 显著	+; 或显著或不显著

a: 估计结果来源于 Probit 和 Logit 模型。显著水平在 10% 及以下。这里只列出了初始财富、教育、经验和年龄等变量的估计结果,因为这些变量被认为是能够体现风险态度、企业家能力和金融约束这些影响创业的因素。

b: 学徒经验包含在企业家经验里。

c: 对于低的教育水平,是正的显著影响;对于高的教育水平,是正的但不显著。

三、中国的就业选择研究

在理解了就业选择的可能微观机理和重要实证结论后,本文将注意力转向研究中国就业选择的文献。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很

少有研究明确考虑风险态度、企业家能力和金融约束等因素对创业选择的影响。

尽管有文章研究了农民进城打工的影响因素(例如,De Brauw 等,2002^[18]; Zhao, 1999^[19]),但是很少有论文研究哪些因素影响人们在受雇佣和自主

① 假定人们是风险中性的并不意味着现实世界中人们就是风险中性的。因此,回归估计中初始财富的系数也可能反映了风险态度对创业活动的影响。

创业之间进行选择。另外，几乎没有文献讨论风险态度、企业家能力和金融约束对择业的影响。这些问题在中国具有普遍性，但却缺乏相关研究。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首先描述中国的金融约束问题，然后讨论农民离开农村加入到劳动力市场所面临的风险，最后探讨企业家能力的作用。

中国私营企业发展迅速，但是无论是初始资本积累阶段还是后期快速发展阶段，私营企业来自于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非常有限。例如，从1993年到1996年，国有银行将超过90%的贷款贷给了国有企业（Lin和Yang，2000^[20]）。Jin和Qian（1998）^[21]、Pan和Park（1998）^[22]同样发现正规金融机构倾向于支持乡镇企业而非私营企业。不仅现存的私营企业难以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信用支持，创业者同样很难得到支持。

私营企业越来越依靠家庭储蓄（Lin和Yang，2000^[20]）。除了家庭储蓄，私营企业会从非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但是利率高出正规金融机构很多（Lin和Yang，2000^[20]；Park等，1997^[23]）。事实上，据调查，1995年的非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比正规银行高出40%左右（Park等，1997^[23]）。

除了金融约束外，中国的企业家还面临两种风险。第一种风险是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不可预知的波动，以及产品需求和生产要素供给的不稳定。这种风险可以视为市场风险。第二种风险是地方政府的干预。地方官员往往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干预企业的生产和投资行为，甚至是吊销其营业执照（Odgaard，1992^[24]）。

企业家能力对于创业活动同样很重要。企业家需要生产、技术和管理技能以便把握住潜在的盈利机会。Odgaard（1992）^[24]在中国仁寿县采访年轻的企业家时发现，年轻的创业者往往是通过学徒方式学习到自主创业必需的技术和管理技能，然后进行创业的。Walder（2002）^[25]同样发现在中国农村，非农就业人员和集体企业的管理者比农民更容易选择非农创业。这是因为这些职业能够帮助人们获得创办企业必需的技术和管理能力。

关于中国农村地区为数不多的创业研究发现，个人和家庭因素在就业选择过程中有重要作用。例如，有些研究发现教育、技能培训和家庭劳动力规模对创业活动有正的影响（De Brauw等，2002^[18]；Wu，

2002^[26]）。男性比女性更容易选择自主创业。此外，家庭背景同样会有重要影响。企业家的子女更有可能创业。除了个人和家庭因素外，职业背景对就业选择也有重要影响。Odgaard的调查（1992）^[24]显示在创业之前，30%的创业者受雇于集体或者私营企业。Walder（2002）^[25]同样发现工人和集体企业管理者比农民更有可能创业，因为这些职业所提供的工作经验对于创业很有帮助。政治背景对创业活动没有显著影响。Wu（2002）^[26]将是不是党员这一虚拟变量加入回归中以分析政治背景对创业活动的影响，但并未发现有显著影响。类似地，Walder（2002）^[25]发现跟农民相比，地方干部创业的可能性并不高。一些研究发现商品市场的良好发展对私营企业的发展有积极影响（Jin和Qian，1998^[21]；Pan和Park，1998^[22]）。还有一些研究发现社会关系（Social Network）对于城市居民的创业活动很重要（Djankov等，2006^[27]；Yueh，2009^[28]；Yueh，2012^[29]）。此外，有研究发现城市居民的创业活动有一部分是由于无法在正规部门找到工作而不得不进行的创业活动，还有一部分是商业机会诱致的创业活动（Liu和Huang，2016^[30]）。

到目前为止，有关就业选择的中文文献中很少有研究明确考虑风险态度、企业家能力和金融约束等因素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当然，有些实证分析中某些变量的使用或多或少体现了这些因素。例如，实证分析中用到的教育、技能培训和职业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企业家能力。有关就业选择的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之间还存在一条待跨越的鸿沟。

四、自主创业最新研究进展和研究展望

过去十几年里，自主创业领域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出现了新的研究方向。在这一节里，我们概括描述自主创业研究的最新进展并指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一）创业与创新

Schumpeter（1921）^[31]认为企业家是通过创造性的破坏把创新引入市场并承担市场风险的一群人。创新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源动力，但是创业并不一定意味着创新，并不是所有创业的人都在从事创新活动。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创业与创新之间的关系。Baumol（2005）^[32]把企业家分为创新性企业家（Innovative Entrepreneurs）和复制性企业家（Replicative

Entrepreneurs) 两类, 并认为只有前者才是经济保持长期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Alba-Ramirez (1994)^[33]、Earle 和 Sakova (2000)^[34]、Martinez-Granado (2002)^[35] 和 Santarelli 和 Vivarelli (2007)^[36] 发现某些自营工商业的扩张是由于缺乏就业机会所导致的。Faggio 和 Silva (2014)^[37] 发现自营工商业的扩张未必一定导致创新。利用英国的数据, 他们发现在城市里, 自营工商业的扩张确实导致了创新活动的增加, 然而在农村地区这种关系并不存在。如果创业活动未必导致创新的话, 那么我们需要区分不同类型的创业活动, 政府的政策也需要更多地鼓励和支持那些能够带来创新的创业活动。

(二) 创业活动与经济增长

Audretsch 和 Thurik (2001)^[38]、Acs 和 Armington (2004)^[39] 利用 OECD 国家样本, 将经济增长速度与自营工商业比例和小公司比例等衡量企业家精神的变量进行回归, 发现创业活动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些发现与 Thurik (1999)^[40] 的研究结果一致。Thurik 发现在 OECD 国家, 自营工商业的比例与就业增长速度正相关。对创业活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数量有限, 主要集中在对发达国家的研 究, 还没有扩展到发展中国家。此外, 现有的研究主要发现两者之间的相关性, 还没有很好地解决内生性问题, 因而无法识别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对发展中国家创业活动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以及计量上如何解决内生性问题, 将是这一领域里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三) 人力资本与企业家精神

Lazear (2004^[41] 和 2005^[42]) 认为企业家是具有多种技能的人。多种技能可以使企业家在创业初期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相比较而言, 工人一般只具有一种特定的技能。因此, 那些具有多种多样教育和工作经历的人在创业机会出现时更有可能进行创业。Lazear 认为个体可以通过教育、在职培训和转换工作来获得创业所需的各种各样的技能。Lazear (2005)^[42]、Wagner (2003^[43] 和 2006^[44])、Lechmann 和 Schnabel (2014)^[45]、Chen 和 Thompson (2016)^[46] 实证发现具有多种技能的人创业的可能性更高。此外, Parker 和 Van Praag (2006)^[47] 认为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影响信贷约束来对创业活动产生影响。他们认为

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个体往往面临较低的信贷约束, 因而更有可能创业。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人力资本在创业活动中的作用以及人力资本如何与信贷市场相互作用进而影响创业活动。未来这一领域的研究有可能成为自主创业研究中非常活跃的一个方向。

(四) 社会身份 (Identity) 与就业选择 (Career Choice)

除了第一节里描述的影响创业活动因素外, 还有一类因素对于个体就业选择的影响引起了研究者们的注意。个体通常以自身处于哪个社会类别来看待和认识自己 (Akerlof 和 Kranton, 2000^[48]; Humlum 等, 2012^[49])。某些就业选择尽管没有太高的收入, 但会通过提升个体在社会中的身份和形象 (self-image) 给个体带来效用, 进而吸引个体从事相关职业。社会身份如何影响就业选择和创业活动可能会成为未来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五) 非营利企业 (Not-For-Profit Enterprises)

如果个体创业的动机来自于对利润的追逐, 那么为什么会建立非营利企业呢? 非营利企业不以利润为追求动机, 有明确的自我赋予的社会使命。非营利企业是现代经济体里的一个重要的部门。以美国为例, 非营利企业产值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已经占到了美国 GDP 的 7% (Steuerle 和 Hodgkinson, 1999^[50])。Glaeser 和 Shleifer (2001)^[51] 对于追逐利润最大化的个体为什么会建立非营利企业, 提出了一个解释。非营利企业和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的主要区别在于, 非营利企业禁止将企业利润分配给对于企业有实际控制权的管理者。这一规定削弱了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 但是在无法分配企业利润的情况下, 企业家降低产品质量的动机大大降低, 他们更看重产品的质量而不是利润。这就暗示消费者非营利企业产品质量优异。消费者会更信赖非营利企业, 因而愿意为非营利企业的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家所能获得的好处可能会超过营利性企业, 因此会选择建立非营利企业。对非营利企业的研究很有可能会成为未来企业研究领域里的一个重要方向。

除了以上这些研究方向外还有一些问题目前的研究还较少涉及。比如说, 创业活动在经济中的外溢效应 (spillover effects), 创业活动如何强化市场竞争, 促进创新和降低社会排斥。政府管制如何影响创业活动? 政府促进创业活动的政策到底有什么样的效果

(Policy evaluation)? 创业活动展现了很强的区域差异, 到底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区域差异? 这些研究问题都有很强的政策含义, 而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多。未

来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将会是创业活动领域里重要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 [1] Schumpeter J,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M]. New York: Harper, 1943.
- [2] De Soto H, The Other Path [M].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1989.
- [3] Kihlstrom R E, Laffont J-J, A General Equilibrium Entrepreneurial Theory of Firm Formation Based on Risk Aversion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9, 87 (4): 719 - 748.
- [4] Chamley C,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and Liability in a Model of Self-Selection [J].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3, 14 (1): 70 - 80.
- [5] Evans D S, Jovanovic B, An Estimated Model of Entrepreneurial Choice under Liquidity Constraint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9, 97 (4): 808 - 827.
- [6] Eswaran, M, Kotwal A, Access to Capital And Agrarian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J]. Economic Journal, 1986, 96 (382): 482 - 498.
- [7] Banerjee, A V, Newman A F, Occupational Choice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3, 101 (2): 274 - 298.
- [8] Ghatak M, Jiang N N-H, A Simple Model of Inequality, Occupational Choice, and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2, 69: 205 - 226.
- [9] Colombo E, Valentinyi A, Occupational Choice, Financial Market Imperfections and Development [R].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Milan—Bicocca, 2002.
- [10] Mesnard A, Ravallion M, Wealth Distribution and Self-Employment in a Developing Economy [R].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Toulouse, 2002.
- [11] Paulson A L, Townsend R, Entrepreneurship and Financial Constraints in Thailand [R].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1.
- [12] Blanchflower D G, Oswald A J, What Makes an Entrepreneur? [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998, 16 (1): 26 - 60.
- [13] Burke A E, FitzRoy F R, Nolan M A, When Less is More: Distinguishing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Choice and Performance [J].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0, 62 (5): 565 - 587.
- [14] Xu B, A Reestimation of the Evans-Jovanovic Entrepreneurial Choice Model [J]. Economic Letters, 1998, 58: 91 - 95.
- [15] Evans, D S, Leighton L S, Some Empirical Aspects of Entrepreneurship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9, 79 (3 June): 519 - 535.
- [16] Holtz-Eakin D, Joulfaian D, Rosen H S,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s and Liquidity Constraints [J].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4, 25 (2): 334 - 347.
- [17] Dunn T, Holtz-Eakin D, Financial Capital, Human Capital, and the Transition of Self-Employment: Evidence from Intergenerational Links [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00, 18 (2): 282 - 305.
- [18] DeBrau A, Huang J, Rozelle S, Zhang L, Zhang Y,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Rural Labor Markets during the Reforms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2, 30: 329 - 353.
- [19] Zhao Y, Leaving the Countryside: Rural-To-Urban Migration Decisions in China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1999, 89 (2): 281 - 286.
- [20] Lin Y, Yang Y, Chinese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East Asian Miracle [R]. Working Paper. 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Beijing University, 2000.
- [21] Jin H, Qian Y, Public Versus Private Ownership of Firms: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8, 113 (3): 773 - 808.
- [22] Pan S, Park A, Collective Ownership and Privatization of China's Village Enterprises [R]. Working Paper, The William Davidson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8.
- [23] Park A, Brandt L, Giles J, Giving Credit Where Credit is Due: the Changing Role of Ru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China [R]. Working Paper. The William Davidson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7.
- [24] Odgaard O, Entrepreneurs and Elite Formation in Rural China [J].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92, (28): 89 - 108.
- [25] Walder, A G, Income Determination and Market Opportunity in Rural China, 1978—1996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2, 30: 354 - 375.

- [26] Wu X, Embracing the Market: Entry to Self-Employment in Transitional China, 1978—1996 [R]. Research Report. Population Studies Cente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2.
- [27] Djankov S, Qian Y, Roland G, Zhuravskaya E, Who are China's entrepreneur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6, 96 (2): 348—352.
- [28] Yueh L, Self-employment in urban China; Networking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9, 20 (3): 471—484.
- [29] Yueh L, Legal development, financial repress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a marketizing economy [J]. The Chinese Economy, 2012, 45 (4): 39—82.
- [30] Liu C Y, Huang X, The Rise of Urban Entrepreneurs in China: Capital Endowments and Entry Dynamics [J]. Growth and Change, 2016, 47 (1): 32—52.
- [31] Schumpeter J,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21.
- [32] Baumol W,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Toward Their Microeconomic Value Theory [R]. AEI-Brookings Joint Centre for Regulatory Study, Publication No. 05—38, Washington, 2005.
- [33] Alba-Ramirez A, Self-employment in the midst of unemployment; the case of Sp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J]. Applied Economics, 1994, 26 (3): 189—204.
- [34] Earle J S, Sakova Z, Business start-ups or disguised unemployment? Evidence on the character of self-employment from transition economies [J]. Labour Economics, 2000, 7: 575—601.
- [35] Martinez-Granado M, Self-Employment and Labour Market Transitions; A Multiple State Model [R]. CEPR DP 3661, 2002.
- [36] Santarelli E, Vivarelli M,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process of firms' entry, survival and growth [J].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007, 16 (3): 455—488.
- [37] Faggio G, Silva O, Self-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urban and rural labour markets [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14, 84: 67—85.
- [38] Audretsch D B, Thurik R, Linking entrepreneurship to growth [R]. OECD STI Working Paper, 2081/2, 2001.
- [39] Acs Z J, Armington C, The impact of geographic differences in human capital on service firm formation rates [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4, 56: 244—78.
- [40] Thurik R, Entrepreneurship,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growth [M]. In: The Sources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Libecap, G. D., JAI Press, Stamford, CT, 1999.
- [41] Lazear EP, Balanced Skills and Entrepreneurship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4, 94 (2): 208—211.
- [42] Lazear EP, Entrepreneurship [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05, 23 (4): 649—680.
- [43] Wagner J, Testing Lazear's jack-of-all-trades view of entrepreneurship with German micro data [J].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2003, 10 (11): 687—689.
- [44] Wagner J, Are nascent entrepreneurs "Jacks-of-all-trades?" A test of Lazear's theory of entrepreneurship with German data [J], Applied Economics, 2006, 38 (20): 415—2419.
- [45] Lechmann D SJ, Schnabel C, Are the self-employed really jacks-of-all-trades? Testing the assumptions and implications of Lazear's theory of entrepreneurship with German data [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4, 42 (1): 59—76.
- [46] Chen L W, Thompson P, Skill Balance and Entrepreneurship: Evidence from Online Career Histories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6, 40 (2): 289—305.
- [47] Parker S C, Van Praag C M, Schooling, Capital Constraints, and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The Endogenous Triangle [J]. Journal of Business & Economic Statistics, 2006, 24 (4): 416—431.
- [48] Akerlof G A, Kranton R E, Economics and Identity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0, 115: 715—53.
- [49] Humlum M K, Kleinjans K J, Nielsen H S,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Identity and Career Choice [J]. Economic Inquiry, 2012, 50 (1), 39—61.
- [50] Steuerle C E, Hodgkinson V, Meeting Social Needs: Comparing the resources of the Independent Sector and Government [M]. In: Nonprofits and Government, Boris, E. and C. E. Steuerle, Urban Institute Press, Washington DC, 1999.
- [51] Glaeser E L, Shleifer A, Not-for-profit Entrepreneurs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1, 81: 99—115.

(责任编辑: 李 晟)